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民间文学集

上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民间文学集

上卷

贾之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1·北京

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

主 编 贾 芝

主编助理 金茂年

编 辑 陶建基 陶 阳 郎 樱

黄伯沧 金茂年 赵桂芳

责任编辑 谢郁彦

(京)新登字172号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民间文学集

(上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41.5印张 6插页 792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1364-6/I·967 定价：(平)20.70元

ISBN7-5059-1365-4/I·968 定价：(精)26.00元

出版说明

(一)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新文艺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深刻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它是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编纂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目的是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研究、总结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衍变的规律和历史经验，提供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我们也期望这部总集，能帮助广大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选择精英，统览各个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从中汲取教益；并能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和研究中国的新文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二) 《中国新文艺大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反映我国新文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概貌。

(三) 《中国新文艺大系》按历史时期分辑，由近及远地编纂出版。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八二年底，共分五辑：第一辑〔1917—1927〕；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第四辑〔1949—1966〕；第五辑〔1976—1982〕。若干年后，将续编以后的各辑

《中国新文艺大系》每辑按文学艺术的门类和体裁分集，各辑的分集根

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所有分集均有主编撰写的导言。

(四) 这次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为第四辑，共十九集。其理论部分包括评论集和理论史料集；文学部分包括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集、杂文集、报告文学集（包括通讯、特写）、儿童文学集、民间文学集，少数民族文学集；艺术部分包括戏剧集（话剧、戏曲）、电影集、曲艺集、音乐集（声乐、器乐、歌剧）、美术集、摄影集、舞蹈集、书法集；优秀的长篇小说本辑不列分集，其目录由理论史料集收选。

本辑的编纂，仍然聘请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各分集的主编；仍然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十七年的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衡量，同时考虑某些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代表性，强调尊重历史、反映历史，强调质量第一，作到精选、严选、拔萃与代表性相统一，全面地反映新中国十七年文艺的概貌。

香港、澳门、台湾作家的作品，因资料不全，难于精确选拔，暂不收录，俟条件具备，另行增补。作品编排一般以首次发表时间或所据版本的时间为序，少数分集分类后再按时间先后排列。个别作品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的文字改动或由编者订正讹错。

(五) 《中国新文艺大系》的编纂，是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文艺界的大力支持、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到有关部门及海内外专家、读者的热情赞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并恳请惠予教正。

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五月

導言

贾 芝

当读者打开这部介绍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厚书的时候，大概会惊异竟有这么多色彩斑斓的动人作品，很多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文学史家也不曾将它们写入中国文学史或世界的文学史。我们都会惊异地发现，正是这些长长短短的动人肺腑的口传文学作品，记载着中华各民族的历史踪迹。我们由衷地感到自豪，中国人民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和语言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今天，这些蕴藏在人民心中、流传久远的民间文化宝藏能够与世人相见，其中包含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人民大众的民间文学的新生。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人民的当家作主，使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跃上了宝座。建国后十七年发掘、抢救的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无论是神话、史诗、情歌还是民间传说故事或其它各种形式的作品，有如奇峰突起，郁郁葱葱，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它们彻底改变了一些文艺家轻视民间文学的无知和偏见，它们为新的中国文学史增添了独闪异彩的最有生气的篇章。

今天，我们在少数民族的民歌里尚可看到不少反映远古初民社会的古歌。没有文字的民族无不有自己的口头文学，有不少民族的口头文学甚至记载着他们的民族的全部历史，包括民族起源、民族迁徙、祭祀仪式以及各种生活习俗、道德信仰、处世哲学，简直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百科全书。有的民族，口头文学与原始宗教融为一体，有的宗教经典里还保存了本民族的民

间文学。例如纳西族的《东巴经》^①，傣族的《贝叶经》^②，彝族的贝玛文经书^③等无不如此。

虽然这些人民大众的口传文学对民族的生存和各民族文学的艺术发展是如此之重要，然而它却历来都备受轻视。一部中国文学史，过去仅只是汉族文学史，许多今天还活在各族人民口头上的经典作品不能入史，甚至对世界早已注目的史诗都不曾提及。是谁把中华民族这笔巨大的民族文化财富拒之门外，竟然让它长久沉睡于地下而不为世人所知呢？旧时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和鄙视，民族语言的隔阂和障碍，造成了文化的封闭状态，许多民族流传的民间文学优秀作品很难披露于世。它们无声无息地产生，无声无息地消逝。尽管如此，民间文学却以它顽强的生命力抗争着、流传着，在文学发展史中成为一股自强不息的文艺源流。民间文学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它层出不穷，永不枯竭。一些经典作品，更是经久不衰，成为全民族的代表作。统治者的压迫和歧视终于扼杀不了它，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始终是文学发展的主流与源头，如同山涧的溪流，悄悄地流淌，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它记载着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足迹，孕育了人类的智慧之花。

民间文学以口头创作、口头传播为特点，不用出版即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做到家喻户晓。民间艺人、歌手、故事家既是民间文学的传承者，又是创作者。他们在传承中也融入了自己的才智和个性。一部民族史诗，一篇故事，甚至一首民歌，在流传的历史长河中都包含着无数歌者或讲述者的心血和灵感，增添了新的浪花，以致作品不断产生新的变异。民间文学以富有民族性和地方性为特征，它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也是一个民

① 《东巴经》：纳西族东巴教的经书，大都用象形文字写成，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医药、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农牧产品、风土人情等，是古代纳西族的百科全书，其中保存了很多神话，如《黑白之战》等名篇。

② 《贝叶经》：傣族的经典。将亚热带的贝叶树叶剪裁为宽十厘米，长六十厘米，压干后用铁笔在上面刻文字，涂上植物油，即显出字迹，装订成册，有的还用金漆涂边，雅致美观，内容为佛教释义、法律、文学作品、自然常识、天文历法、医药、武术等。

③ 贝玛文经书，贝玛，或称毕摩，彝语译音，为彝族的巫师、经师。贝玛识老彝文，通晓经书，社会地位很高，主持驱鬼、占卜、禳灾、祈福、安灵、招魂、合婚以及对窃案进行神明审判等宗教活动。贝玛文经书，多用木炭、蘸鸡血或以竹签墨烟写在木板上，内容多为祭祀经和占卜经，也有医学、律历、神话等。参看《民间文学》1957年9月号《红河区民间文学调查报告》，其中还谈到哈尼族的贝玛一代一代地传授本民族的诗歌和传说。

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从儿童的启蒙教育开始，它就潜移默化地，不为人们所觉察地起着认识和教育的作用。作家文学不同于民间口头文学，它是个人创作，以反映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观察、了解以及个人的思索与他的理想和追求为特征，作品只有在用文字发表或出版后才能产生社会影响。也有许多作家包括大作家，取材于民间文学，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提炼和升华，写下了不朽之作。他们代表人民立言，个人的精神与民族精神在这里达到了融合与统一，这也是他们取得成功的诀窍。

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民族的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推翻了过去所谓“中国无史诗”、“中国无动物故事”一类无稽之谈。人们也意想不到我们今天会搜集到这么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神话。各种题材和形式的民间文学作品，足以在世界文化宝库中陈列一个长长的中国民间艺术画廊。我们在这里仅只摘取这个画廊中的若干艺术珍品奉献给读者。

二

我们编选的这部《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49—1966）分上、下两卷。上卷是韵文卷，包括史诗、叙事诗、长篇抒情诗和歌谣；下卷为散文卷，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寓言、笑话等。两卷约160余万字，是建国后有计划地发掘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的第一批记录整理的成果。本集以编选建国十七年搜集的作品为限，这既是原定的编选范围，从中也可以看出新中国发掘、出版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历史进程。

这次编选我们收入了各地推荐的一部分十七年搜集的作品或打印稿或记录原稿，其珍贵不亚于已出版的作品，有的已于“文革”之后正式发表。《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76—1982）是1987年首先出版的，当时为资料条件所限，未能选入仡佬族、独龙族、怒族、布朗族、哈尼族、佤族、德昂族、京族、俄罗斯族、东乡族、土族、保安族、裕固族、锡伯族等十多个民族的作品，为了使读者可以同时看到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作品，本集既然后出，就应该补齐这些民族的作品。有的民族的作品是十七年中搜集而没有机会发表的，还有“文革”之后才从口头流传记录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稍稍突破编选的时限。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是1976年以后由国

务院识别公布的，他们的作品已选入了《民间文艺集》（1976—1982），本卷便不再收入。这两本集子在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应是一个整体，反映中国民间文学作品近四十年来发掘问世的全貌，两相参照阅读，互为补充，就可以统观全局了。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将各民族的优秀作品全部收入，长篇的创世纪史诗，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等长篇巨著，也只能摘选个别篇章。叙事诗浩如烟海，只能略举一、二。民间故事传说更是山川草木，无不成篇，也仅只能从各种类型的故事中选取若干篇供读者鉴赏。

民间文学是人民的语言艺术创作，也是弥足珍贵的社会历史资料。民族史诗、古歌本来就是被本民族作为历史来讲述和吟唱的，它的认识作用和科学价值可与地下的古老文物相媲美。传说不是历史，然而它却是历史的折射，以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它可以印证历史，有时也竟成为今天能够获得是唯一史料。比如，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和贵州四省的古老的彝族，因地区与支系的不同，创世纪史诗非常丰富。在四川大、小凉山流行着四部著名史诗《古侯阿补》（公史篇）、《勒乌特依》（母史篇）、《武哲》（子史篇）、《古侯略夫》（公史详篇）的多种不同的手写本。其中《勒乌特依》已搜集到四种不同的手写本。流传在云南楚雄的彝族创世纪史诗《梅葛》、《查姆》以及流传在其支系阿细人中的《阿细的先基》，早在建国初期就已搜集出版。民间抒情诗《妈妈的女儿》、《我的么表妹》，撒尼人的民间叙事诗《阿诗玛》，既是彝族的艺术精品，也是那个逝去了的时代的深刻的记忆。《妈妈的女儿》是一首哭嫁歌，是一篇血泪交织的作品。它描写一个为土司放羊的娃子被迫出嫁，痛不欲生，因怕引起对方打冤家，落得“牛角一吹刀炮飞，往背兜里装人头”，连死都不容易，只好忍辱生存，哀哭着自己的不幸。民间故事也多有描写奴隶生活的，本集入选的《阿果斗智》便是一篇惊心的悲壮之作。惨遭奴隶主毒害的娃子阿果，临死时交代家人把他的尸体摆成坐姿，并将马蜂放入巨尔中，以他仍在吹巨尔的假象引诱奴隶主上当，使他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有的民族虽然人数少，但诗歌发达，诗艺高超。云南傈僳族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本集入选的傈僳族《重逢调》，描述了一对不幸分离多年的青年男女的重逢：女方因生活的折磨变得冷若冰霜；男方则唱出他为寻聘礼娶对

方克服重重磨难的经历。但是终因重逢已晚，爱情化为泡影，两人的重逢只能是一场追叙痛苦经历的泪别。《重逢调》属于“含曲花偶”，即找旧情人的歌，在本民族中不许公开传唱，青年人很少会唱，老年人又不肯轻易唱。这篇《重逢调》是周忠枢同志于1954年和1956年两次深入傈僳人村寨采录和翻译的。傈僳族的著名长诗还有徐琳、木玉璋等人搜集翻译的《逃婚调》，祝发清等人搜集的《生产调》以及《牧羊调》、《伤心调》等等，还有古歌《木刮基》和《创世纪》。傈僳族人自己说：“盐巴，不吃不行，歌，不唱不得”。在生活中，他们往往以歌当话，互相对答。他们还有赛歌的习俗，有一年一度的“汤泉赛歌会”。

本集在编选中还注意照顾到作品的题材和内容，特别是散文卷和韵文卷中的歌谣部分更是如此，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看到民间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这里不妨举神话为例，从这些古老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对自然界的观察与思索，内容是异常丰富的。我国各民族的神话变幻莫测，飘忽不定，杳无际涯，深藏着大自然和人类童年的奥秘。最初的神话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当时人们认为万物都有灵魂，皆有意识，都象人一样地行动和生存。天真的幻想成为他们认识和描绘天地万物的手段，以致神话创作中出现了许多色彩斑斓的奇异作品。傣族说大地是由荷花瓣变成的（《大地是怎样来的》）；普米族说天神尖若线鲁带六只神狗造了天地（《尖若线鲁造天地》）；黎族说神仙让兄妹二人躲进葫芦避过洪水，以后他们结婚繁衍人类（《人类的起源》）；侗族说龟婆孵蛋，孵出一男一女，成为人类的始祖（《龟婆孵蛋》）；回族的阿旦在主的度化下，左肋下生出一个包，蹦出了海尔玛太太，与她结为夫妻繁衍人类，他的脑袋中跑出来的灵气变作天地万物（《阿旦与海尔玛》）；河南至今流传着汉族的古老神话女娲抟土造人和补天的故事（《抟土造人和黄帝》、《女娲补天》）；布朗族的额米亚用犀牛皮做成天，眼睛做成星星，犀牛血变成水，毛变成花草树木，脑浆变成人，骨髓变成鸟兽，最后他还用犀牛的四条腿支住天，鳌鱼托住地（《额米亚》）；拉祜族巨人扎弩扎别则变成树木、竹林，为人类造福，变成荨麻、飞蚁同害死他的天神搏斗（《扎弩扎别》）；水族的一对可怜的恋人太阳和月亮，被巫师拆散，分别关在天上的两个星星里。一个热，一个冷，一个走白天，一个走黑夜，永不相见（《太阳和月亮》）；满族说太阳和月亮是神女炼的铜

镜在天上照射（《太阳和月亮的传说》）；哈尼族说天上出了九个太阳，勇士俄普浦洛射落了八个，剩下一个躲在山后，是公鸡真诚、热情的啼叫唤出来的（《为什么公鸡叫太阳出来》）；壮族说太阳是父亲，月亮是母亲，星星是孩子，残暴的父亲每天早上都要吞食自己的孩子，鲜血染红天边变成了早霞（《太阳、月亮和星星》）；苗族美丽的姑娘仰阿莎受骗嫁给了又丑又懒的太阳，太阳贪财做生意，三年不归，她与标致勤劳的月亮逃走了（《美丽的仰阿莎》）；为遮住月亮毒热的光，瑶族的小伙子雅拉，用织有妻子的锦绣绑上箭头，月亮被蒙住了，发出幽幽的白光，妻子也飘上了天空，飞进月亮。妻子急中生智，用长发编成一条发辫拖下来，雅拉抓住发辫也爬进了月亮（《射月亮》）；蒙古人说月蚀是被魔鬼吞食的结果（《月蚀的传说》）；赫哲族的萨满一口气把马沙哈特吹到天河叉鱼去了（《天河》）；满族天神的女儿，善良的白云格格，为拯救地上的生灵，冒犯了父亲，尝尽寒苦，变成了白桦树（《白云格格》）；佤族人讲述了他们怎样发现了火，学会了种谷和造房子（《我们是怎样生存到现在》）；彝族说聪明的青蛙把能说话的仙水让给了人类，引诱其它野兽、树木选择不会说话的水喝（《天神的哑水》）等等，等等。这就是原始初民们对天地万物来源的理解和解释，探索和思考，并把人的思想、人间的各种遭遇巧妙地附会到自然现象上去了，真是扑朔迷离，千奇百怪，妙趣横生。这些作品也反映了不同民族生活的世界和他们对事物来源的古老的记忆。本集共选入神话作品32篇，其中包括了二十个民族的作品。散文卷分为神话、传说和故事三大部分，为了便于阅读和醒目起见，每部分又分为若干组，大致按内容排列。无论是韵文卷或散文卷，选入的作品较多，不能详加介绍，还是请读者走进这个民间文学的百花园中自己观赏吧！

三

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间文学的发掘，往往是同民族解放事业，同民主革命运动密切相联，并互为因果，中国也不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四时期作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先声的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有识之士首先提倡搜集近世歌谣；为什么我们在取得了人民革命胜利之后，才能够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整理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遗产。中国民间文学宝藏

的发掘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是息息相通的。国家兴旺发达，社会和政治稳定，民间文学事业就繁荣；国家遇到挫折，民间文学工作就萧条中断。当我们欣赏这些在十七年中间世的琳琅满目的民间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些作品是怎样从地下被发掘出来，拂去尘埃，焕发出新的光辉，还应当了解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艰辛曲折。这段历史是值得我们回顾和记忆的。我们要从中寻觅从创业开始的历史足迹，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的道路。同时，我们还要记下那些默默无闻、奋力拼搏的献身者。

从建国到1966年为止，民间文学事业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1950——1955年为发轫时期。

1950年3月29日，也就是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仅只半年的时间，宣布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近几年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此后直至今天，民研会成为发动搜集和研究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工作中心。

民研会的第一任理事长郭沫若在成立大会上，以坦率而风趣的口吻说：

“说实话，我过去是看不起民间文艺的，认为民间文艺是低级的、庸俗的。直到1943年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这才启了蒙，了解对群众文学、群众艺术采取轻视的态度是错误的。在这以后，渐渐重视和宝贵民间文艺。”^①

他的这番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了过去作家、艺术家轻视民间文艺的错误。这次发言中，他讲了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五个目的和中国的历史经验：

1)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要组织一批捕风的人，把正在刮的风捕起来保存，加以研究和传播，今天我们不能再让它自生自灭；

2)学习民间艺术的优点。民间艺术的立场是人民，对象是人民，态度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作家应当从民间文艺中学习，改正自己创作的立场和态度。在诗歌，要学习它表现人民情感的手法、语言，学习它的韵律、音节，同时还可以借民间的东西来改造自己；

^① 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1950年新华书店出版。

3)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文艺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是现实生活的评价与再批判。民间文艺中，或明显地，或隐晦地包含着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政治的批评。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民间文艺不单着眼于它的文艺价值，还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群众的政治意见，民间文艺是一面镜子，能照出政治的面貌来；

4)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

5)发展民间文艺。我们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应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为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今天应该说，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艺。

郭老提出的这五点历史经验，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见地的，特别是他指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启了蒙”这个话，是最重要的启迪。建国以来，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正是沿着从解放区开端的革命文艺路线前进的，其根本特点就是“立场是人民，对象是人民，态度是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从而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学这一新学科的一系列特点。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以后，各地反映热烈，许多专家、学者和民间文艺的热心搜集家、鉴赏家，纷纷应征寄赠各种文艺书刊和原稿。只要看看当时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连续三期在刊末公布的收到寄赠资料目录，便可略知大概，截止到1951年7月寄赠资料目录为858条。其中有程砚秋赠的寒亭年画八张；容肇祖赠的《歌谣》周刊108期、《粤讴》（招子庸著）、《二荷》（广东地方唱本）和他自己著的《传说与迷信》；王骥寄《中华谚海类编》两册；王存义寄《民间文艺集》10册；徐悲鸿寄陈志农剪纸一幅和他为之写的一篇短评等等。不少地区还燃起了搜集民间文艺的星星之火。例如贵州军区宣传部向在贵定县下乡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五百多名文工团员发出搜集驻地苗、彝等少数民族民歌的通知，要征集万首民歌。短短的几个月，他们就搜集了3800首民歌，其中以情歌为最多，也有不少欢唱解放翻身的新民歌。

在民研会成立后的第四天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首先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民间文学丛书》、一套《中国民间音乐丛书》，并且当场定了一部分选题：如收入何其芳、张松如编的《陕北民歌选》、光未然搜集的《阿经

的先基》、安波、许直的《东蒙民歌选》、严辰的《信天游选》。后来陆续增添了高泽的陕南《茅山歌选》、广西宜山农民报编的《柳州宜山山歌选》、李刚夫采录的藏族民歌《康藏人民的声音》等等。第一批入选的还有反映近代蒙古人民反抗军阀残暴统治的长篇叙事诗《嘎达梅林》。韩燕如的《爬山歌选》则是民研会直接参与编选的第一部汉族民歌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还收入了边垣在新疆监狱里从一位难友蒙古艺人满金口中记录的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重要章节《洪古尔》，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世界闻名的蒙古族史诗《江格尔》。

《中国民间音乐丛书》是延安时代就曾组织采风的吕骥同志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主编的，其中有关立人根据延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搜集的民歌整理的《陕甘宁根据地民间歌曲选》，安波编的《秦腔音乐》，常苏民编的《山西梆子音乐》，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编的《河北民间歌曲选》等共出版八种。1950年冬，民研会刚成立不久，首先创刊了不定期的《民间文艺集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民间文艺理论研究刊物，也发表少部分作品。

遗憾的是，尽管初创时期各地反映热烈，但民间文学依然未能完全摆脱受歧视的命运。仅仅过了一年多，到1951年冬天，只出了三期的《民间文艺集刊》就停刊了。民研会工作从此陷入停顿达两、三年之久。中国民间文学丛书因当时受到新成立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支持，编辑出版工作才不致中断。党和政府一向是重视民间文艺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倡民歌、革命故事。重视劳动人民的创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在解放战争行军途中，毛主席还讲过：“以后每个县的宣传部要有一个人专管搜集民间文学。”^①周总理提倡文艺创作要“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至今还是指导文艺创作的正确方针。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也明确地规定了发掘整理中国各民族民间文艺丰富蕴藏的任务。但是，蔑视人民大众文艺创作的思想似乎是一个幽灵时隐时现，正是这个幽灵以及其它原因，使刚刚迈步的民间文艺工作就受到了冷遇。1954年4月，经过种种努力，民研会终于得以保存下来，以团体会员名义加入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恢

^① 见1964年胡乔木谈对《民间文学》的意见记录打印稿。

复工作，并创办了《民间文学》月刊；《民间文学》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的时间里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份民间文学刊物。自从《民间文学》创刊，民间文学工作从此有了一个阵地，工作日益开展起来。

1955—1958年，工作发展时期

民研会刚成立时的工作范围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戏剧、民间曲艺、民间舞蹈，这时因人力和条件所限，改为主要是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

《民间文学》的编辑方针是：“面向广大读者，为群众提供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同时作为开展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阵地，担负着推动全国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以及培养专业人材的任务。直到1966年3月文化大革命风雨紧迫时停刊，一共出版了107期。如果您浏览一下自1955年起十二个年头的《民间文学》，很可以看到中国这许多民族的口传文学逐渐发掘问世，日益兴旺发达的一个大致轮廓。它使您宛如走进一个文艺的百花园，可以尽情观赏各种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艺术奇葩，它们的名字许多是过去闻所未闻的。

民间文学工作的历史任务是发掘，保存和继承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搜集和研究人民的口传文学。这是一个开拓性的工作，只能从深入群众调查采录开始。建国后的采录工作，比起五四时代单靠征集作品，靠从姑姑姨姨那里听到几个故事，追忆祖母讲过的故事，或仅仅着眼于从坊间、书商搜集唱本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解放后，首先风起云涌的是各族人民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解放军的新民歌。我们最早出版的新故事是《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传说。传统民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情歌，它们是诗歌艺术中的上品。1953年，云南文工团圭山工作组在圭山地区的彝族村寨搜集了撒尼人的叙事诗《阿诗玛》。这部长诗描述彝族姑娘阿诗玛为婚姻不自由而遭到的不幸，使她终于变成了崖壁上人们呼唤她的回声。《阿诗玛》的整理出版把少数民族的长篇叙事诗第一次推到了令人瞩目的地位，曾译为几种外文出版。

1956年2月，老舍先生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报告》，会前他听取了六个民族地区的代表座谈的意见，报告中强调了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性，这次报告对后来开展少数民

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那时，有的地方作家协会也参与了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如云南搜集民间文学较早，就是由云南作协开始发动的。也是从这一年起，青海在省委宣传部长黄静涛同志的主持下，开展了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搜集和汉译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手抄本、木刻本、还广泛搜罗了国外有关的专著，从藏文和外文翻译了一共有74部《格萨尔王传》的原作和有关论著，作为内部资料出版；此外，还正式出版了《霍岭大战》上半部的汉译本。

这时，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为了贯彻这一重要的指导方针，《民间文学》于1956年第8期也发表了题为《民间文学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论，社论中特别强调了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科学性的要求，并提出“忠实记录，慎重整理^①”的原则。社论中还指出民间文学现在从一向被鄙视的地位登上了“大雅之堂”，展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文中列举了藏族寓言、民间故事《咕咚》、《葫豆雀和凤凰蛋》、《青蛙骑手》、维吾尔族的《阿娜尔罕的歌声》、《木马》、壮族的《一幅壮锦》、蒙古族的叙事诗《红色勇士谷诺干》、《苗族古歌》、《苗王张志岩》、纳西族的《猎歌》、《人类迁徙记》、傈僳族的长歌《逃婚调》等等作品。还提到许多不同形式、不同诗风的民歌，象彝族的“拉夜”，回族的“花儿”，壮族的“欢”，南方的四句头山歌等等。不少著名的民间艺人、歌手演唱或发表了自己的新作品，如蒙古族毛依罕的《铁牯牛》，山东快书艺人高元钧的《武松传》，都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汉族的民间故事传说除了较早引人注意的《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著名传说和《地主与长工的故事》以外，象《蛇郎》、《找姑鸟》、《石榴》、《秃尾巴老李》、《望娘滩》、《长白山的故事》等等民间童话、幻想故事，也渐渐发表得多了。解放七年的时间，人们已经能够读到二十二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不同省区的作品了。

与此同时，民间文学工作也一直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早在1956年，《民间文学》编辑部接连收到一些读者批评指责的来信，提出有的故事情节“违反总路线的精神”，有的则含有毒素，宣传了因果报应思想等等。读者中产生这些怀疑和反感，主要是由于他们把现实与幻想混淆起来，把艺术与科学也混

^① “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原是晋西北李东为等同志在搜集出版的民间故事《水推长城》一书中提到的一项工作经检，我们在社论中加以推广。

为一谈，一切以今人的观点或政治运动的标准来衡量、来要求于过去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幻想作品。这种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对于这样一些出于政治热情而“简单化”、“公式化”的批评，我们只能采取解释和疏导的方法。编辑部约请毛星同志写了一篇《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①的评论，回答了这些问题。1955—1957年，从批判胡风集团到反右斗争的严峻的时期，民间文学工作及其队伍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民间文学界也曾经错误地把学术观点的分歧上升到阶级矛盾，伤害了一些同志，经验教训是异常深刻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影响却至今尚在，现实至今还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尽管我们经历了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但是我们却坚信社会主义方向，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大的目标下，我们能不断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团结一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支越来越庞大的民间文学工作队伍，在探索 and 追求中不断地前进。难怪连有些外国朋友在看到我们发动的遍及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如此深入广泛的民间文学采录和取得的显著成就时，也都赞美新中国条件的优越性。

1958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倡搜集民歌，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采风运动席卷全国，民间文学事业被推上繁荣发展的峰巅，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好像我们前几年的工作是为了迎接这个高潮到来而做的准备似的。五月间《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搜集民歌》的社论。民研会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于七月份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借以全面地推动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一再受歧视的民间文学忽然凌云升空，出现了异常受重视和繁荣发展的局面。全国到处在议论采风，许多文化艺术单位都热衷于参与搜集民歌，同时在左的思潮下，新民歌也出现了反映“共产风”、“浮夸风”的作品。文艺界甚至有人提倡“人人作诗”，民间文学界也有人乐观地鼓吹作家文学同民间文学已经“合流”。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可以把当时盛极一时的新民歌同“左”的错误路线完全等同起来，一概加以否定。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落后的良好愿望和在生产建设中发挥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种意气风发、战天斗地、征服大自然的冲天干劲，那种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传统美德和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异常可贵的；正是由这

① 《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